

西康

地区  
近代社会研究

XIKANG DIQU

JINGDAI SHEHUI YANJIU

王川  
◎ 著

西康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西康

地区

XIKANG DIQU

近代社会研究

JINGDAI SHEHUI YANJIU

王川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王川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01 - 008505 - 0

I. 西… II. 王… III. 西康省-地方史-研究-近代

IV. K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970 号

##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

XIKANG DIQU JINDAI SHEHUI YANJIU

王 川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31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8505 - 0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研究获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资助，  
并由四川省重点建设项目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四川师范大学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序

不久之前，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王川同志，将他的近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稿本供我一阅，拜读之后深感这是一本关于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中的一本比较重要的佳作。

之所以说其重要，在于西南这一区域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一情形又往往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致使其中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说明。之所以说其为佳作，在于王川同志近十多年来一直全面关注这一区域，对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了正确的解答。数年前，他的关于这一区域的另一本佳作《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亦即本书的姊妹篇在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即是最好的说明。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近代西康社会。“西康”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在近代史上确多有变更，以致为一般读者所不详。这可能是对西康地位未能引起充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康”作为一个传统的地域概念早已存在，即我国传统的藏族分布地区卫藏、康、安多三个部分之一，其与历代的行政区划与管理权限并无一定的对应。这应与藏语中三大方言区有关，而后方可形成地域的概念。

“康”是藏语“喀木”（拉丁文转写为“Kham”）的汉语音译，其范围基本相当于今日所谓“川、滇、藏、青毗邻地区三州一地”的地

方。其地包括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康区历史上从来未有统一的行政建制,也不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可见别有用心者说西藏从来就有一个统一的大藏区纯属谬论。由于康区的地理位置连接卫藏与中原,长期为藏、汉、蒙古、满、回、彝、纳西诸民族经济与文化交融的地方,故这一带在所有藏区之中往往能开风气之先。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侵略势力的进入,康区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在1906年清廷在康区乃有“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故其地简称“川边”。而该大臣的设置及有关部门措施正是为了在当地建省奠定基础,故1911年时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在向清廷的奏章中即提出,该省建立后拟名取“西康”。由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故西康建省未果。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川边改设置为“川边特别行政区”,迄至1925年始更名为“西康特别行政区”,由于“西康”一词正式成为我国一级行政区域的名称。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设西康建省委员会,主持政务,筹备建省,经过数年的工作,西康建制终于在1938年12月最终确定。此后,作为西康省的区划除了原川边即“康属”外,还包括从四川划入的“雅属”(雅安地区)与“宁属”(西昌地区),以及当时被西藏地方政府占据的昌都地区。

西康省自1939年正式建立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撤省,先后共存在了16年时间。1955年国家宣布西康撤省,其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其昌都地区又划归西藏自治区。此后西康作为一个省级区域已不复存在。但是,广而言之,西康作为我国一个行政区域其历史应从1906年清廷于此正式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时算起,其后还历经了民国的北洋政府设置“川边特别行政区”和“西康特别行政区”时期,民国的国民政府

设置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省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康建制时期,其先后共 50 年之久。

在近代的这 50 年中,西康作为我国西南部一个省级单位,其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在地理上是“川滇屏蔽,藏卫根基”,所谓“治藏必先安康”之地,而且地连缅甸和印度,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边疆地区,直接承担着捍卫祖国边防的作用。同时,这里还是除了西藏以外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彝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处理民族问题的得失亦直接影响当地的一切。这些都是必须认真加以总结和研究的方。

近代的川边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历史事件皆与上述客观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比如清末发生在巴塘的戕杀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的“巴塘事件”引起川边设治,辛亥革命以后藏军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三次东侵,三次以“康人治康”为名的巴安(塘)事变、诺那事变与班辕事变,以及大小凉山彝区发生的普雄事件等等,无不皆发生在当地,而影响到全国。由此可见近代西康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

王川同志长期从事近代西康史研究,成就卓著。我们从上述他关于西康的两部姊妹篇专著,即可清楚看到这批优秀的科研成果。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著成就,个人以为这主要在于,首先,他从宏观上全面地把握了西康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与特点,这一点与他比较深厚的历史学专业功底有关;其次,他着手于该社会的重大方面并选出了其具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迹,如“大白事件”、诺那活佛的活动、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等,逐一地加以深入研究与剖析,从而使得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得以清晰起来。还有,王川同志的治学方法也值得称赞。他的治史不仅广泛地搜集了包括正史、档案、方志、札记、碑刻、家谱等在内的大量史料,如四川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他在成都市的四川档案馆抄录了



近代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等史料、在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录了民国时期的稿本《义敦风土志》等,而且还多次亲赴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大量口述史料,如对曾进出西康地区的“国立拉萨小学”教员常希武先生、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政协图嘎先生等进行口述史访谈及研究,然后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以辨明史实。所以,他在本书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不仅符合客观实际,不少史料为人未知晓,而且还有不少新的见解、新的视角,可发人深省,可引人入胜。我想他的这些成功之处,广大读者在阅读了本书后自有深切体会。

总之,本书是研究西康近代社会的一本创新之作,是上世纪以来“康藏研究”的继续,它的出版将是对西南区域研究、地方史研究、民族史研究、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并且能引起学术界对近代的川边、西康乃至传统意义上的整个康巴的进一步重视与研究。这也是我们这些关心弘扬我国藏学中一门新兴学科——康巴学的人的殷切希望。

以上可说是读了王川同志这部佳作后的一点感受,书写出来,不成为序。

李绍明

2009年3月于成都

#### 附录:李绍明研究员简介

李绍明研究员,男,1933年出生,土家族,重庆市秀山县人。华西协和社会学系毕业,现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曾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著有《羌族历史问题》、《巴蜀民族史论集》、《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羌族史》、《川东西水土家》、《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及《四川省志·文物志》、《四川省志·民族志》等专著二十余部;整理《彝族古代史》、《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主持国家级、省级社科重点项目及一级项目研究十余项。



# 立足川康本地, 努力加强西南区域史研究

## (代前言)

王 川

### 一、西康的地域范围及近代发展沿革

西康的地域范围及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本书研究的时空范围。

汉文文献中“西康”一词, 由表示方位的“西”与藏族传统地域概念的“康”(Kham)二字组成, 由来已久且与汉文文献中“西藏”一词有类似之处。

在藏文典籍中, 很早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的“确卡松”(chol-kha-gsum)即“藏地三区”的说法, 如元代《司徒达玛坚赞为安定阿里和清查藏地三区的户口而进藏时雅桑与帕竹双方诉讼于南杰岗》等藏文文献<sup>①</sup>。

“藏地三区”的说法, 在清代汉文、满文中均有, 简称为“三藏”, 如乾隆帝说“廓尔喀则在万里三藏之外, 更数千里。陡壁线路, 不临深川, 不能容马, 人皆踵迹而行”, 以及故宫所藏的清代所绘《三藏卡伦图》、满汉文《三藏分界图》等<sup>②</sup>。

① (元)大司徒·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即《朗氏灵犀宝卷》), 赞拉·阿旺、余万治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18页。

②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第218页。

所谓“康”，是藏族传统区划中沿用至今的地域古称，我国藏族三大聚居区，即卫藏、康、安多之一部，又译为“喀木”、“坎麻”，也称为“康区”或“康巴”地区<sup>①</sup>，拉丁文转写为“Khams”，近现代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1905—1951），在所撰写一部主述藏族历史的藏文典籍《白史》中，认真考证了“康”在藏语中的原意，他如是解释：“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名‘康吉贾阵’也”<sup>②</sup>。这一说法，显然是相对于中心地区卫藏而言。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1894—1989）则认为，“康之得名，源于此地广阔四通”<sup>③</sup>。汉文、满文文献接受了“康”、“喀木”这一说法，如道光年间姚莹《康輶纪行》、满文抄本《喀木地方一统志》、民国初蔡廉洲绘制《喀木康全部图说》等<sup>④</sup>。

康区的地域范围，昔者习惯上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sup>⑤</sup>，大致包括现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大片操藏语康方言的地区。在历史上，康区并无固定不易的疆界，但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

① 李绍明：《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0 页。

② 参见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 页；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更敦群培文集精要》，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0 页。

③ 任乃强、任新建：《“朵甘思”考略》，《中国藏学》1989 年第 1 期。

④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第 219、221 页。

⑤ 在晚清史料中，“丹达山”是西康与卫藏的分界线。如徐柯《清稗类钞》：“康、藏、卫分三区，盖打箭炉以西、丹达山以东为康”（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 册，第 106 页）；西康“与西藏交界者曰丹达山”（第 1 册，第 111 页，又可参第 110 页）。

核心区。如昌都是康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多康”地区的一部分。所谓“多康”,《元史》写作“朵甘思”、“朵哥麻思”,指的是昌都至四川甘孜一带地区<sup>①</sup>。这一地带,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的东缘,是西藏连接内地的枢纽;在文化上处于汉藏、藏彝之间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廊地带,还是藏族文化的主要摇篮之一,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故乡和藏传佛教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在近代汉文文献中,“西康”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清末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炘(1869—1929年)的奏折。傅嵩炘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1911年)的“文案”(秘书长),深得赵氏赏识,他于宣统三年(1911年)6月在奏折中建议成立西康省<sup>②</sup>:“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省’,建设方镇,以为川滇屏蔽,藏卫根基”。但在清末民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文件、地方文书等也一直沿用“川边”之名。所谓“川边”一词,来源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系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川边”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介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属各县以及金沙江以西(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13县,其地理范围“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sup>③</sup>,或者表述为“东自打箭炉、德格,西至丹达山顶三十九族地,南抵维西、

①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74、289页。

② 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③ (清)傅嵩炘:《西康建省记》上卷,廖祖桂点校,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中甸(今云南)及察隅、江卡、察雅(今西藏),北达甘肃、西宁”<sup>①</sup>,与西康地区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

“西康”这一说法,也见于1913年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所撰《给定结两位宗本及亚东、帕里代表的信》等藏文文献:“维修所需钱款,应由西康地区的宗教事业收入费中迅速援助。”<sup>②</sup>而自从“西康”一词在宣统三年(1911年)出现后,它逐渐开始取代“川边”,此后的民国时期,西康与西藏并称,为国内社会各界所接受。如民国十八年(1929年)蒙藏委员会绘制的《西藏西康全图》、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赵璇与李炳卫联合绘制的《西藏西康全图》<sup>③</sup>,以及《西康西藏详图》等<sup>④</sup>;也简称为“康藏”(该词两种涵义并用,另一种意义特指西康),又由于西康、四川相邻,并称二地为“川康”。

所以,西康地区主要包括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这也是本书所说的“西康”。

所谓近代,本书所指为清朝中期以后到西康省撤销这一历史时期,大致指公元1800年(清朝仁宗嘉庆五年)到公元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sup>⑤</sup>。

① 胡吉庐:《西康疆域溯古录》,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00页。

②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主编:《藏文史料译文集》,陆莲蒂中译,1985年7月,第198页。

③ 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第219页。

④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6页。

⑤ 关于近代的起止时间,有很多说法。如美国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 Y. Hsu)眼中的“中国近代史”从公元1600—2000年,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故本书以“近代”涵盖所研究的从清朝中期到西康省撤销这一历史时期。

晚清时期,随着“新政”的推行,国内政界出现了台湾建省与新疆、东北改行省,以及建立“西康行省”之议,但并未完全实行,尤其是西康建省议而未行,这些政区变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部分,其得失是清末“新政”成败的一面镜子<sup>①</sup>。

1925年“西康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西康建省之议又现,但10多年间未得落实。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在康定成立,川康实力派刘文辉(1895—1976)为省主席。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重庆国民政府划归西康省政府管辖46个县和3个设治局,见下表。

民国时期西康省行政区划表(1939年1月—1949年12月)

| 属名 | 下隶之县名及设治局名    |                                                          |
|----|---------------|----------------------------------------------------------|
| 康属 | 19个县(金沙江东)    | 康定、瞻化、理化、九龙、甘孜、泸定、得荣、白玉、丹巴、炉霍、道孚、定乡、德格、巴安、义敦、雅江、稻城、邓柯、石渠 |
|    | 13个县(金沙江西、遥领) | 昌都、恩达、察雅、贡县、武城、同普、宁静、盐井、科麦、察隅、硕督、嘉黎、太昭                   |
|    | 1个设治局         | 泰宁                                                       |
| 宁属 | 8个县           | 西昌、越嶲、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                                  |
|    | 1个设治局         | 宁东                                                       |
| 雅属 | 6个县           | 雅安、荣经、芦山、天全、宝兴、汉源                                        |
|    | 1个设治局         | 金汤                                                       |

<sup>①</sup> 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由于金沙江以西的西藏昌都、恩达、太昭等 13 个县处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之下,西康省属于“遥领”,刘文辉的势力实际并未进入,因而西康省实际上共辖有 36 个县及县级单位:即 33 个县和 3 个相当于县级单位的“设治局”。

表中所列“康属”,即今四川甘孜州境域。除康定、九龙、甘孜、泸定、白玉、丹巴、炉霍、道孚、德格、雅江、稻城、邓柯、石渠与现今县名相同,辖境无重大变化之外,其他各县的简况是:

瞻化今为新龙县、理化今为理塘县、定乡今为乡城县、巴安今为巴塘县;

义敦县,晚清时赵尔丰改土归流,于此设三坝厅;1913 年,改为义敦县;1951 年 11 月和平解放;1978 年 7 月撤县,其地并入今巴塘、理塘县;

邓柯县,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德格县;

泰宁设治局,原名泰凝区,1940 年 6 月改名泰宁,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乾宁县,后并入道孚县;

“宁属”,即今四川凉山州境域。西昌、越嶲(今改名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等县均今仍存,辖境也无重大变化;宁东设治局,后增设德昌县和宁西、普格设治局;

“雅属”,即今四川雅安地区。其中,雅安、荣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 6 个县与现今县名相同,辖境无重大变化,金汤设治局则原明正土司、木坪土司辖地,1928 年宝兴设县时一度拟于该地设金城县,未果;1930 年四川省政府在此设治局,1950 年 3 月改隶康定县,次年设金汤区。

通计西康全省实际所辖地域,东至雅安金鸡桥与四川省分界,西至金沙江与西藏隔江而守,南至会理、宁南与云南相邻,北至石渠与青海接壤。据 1947 年西康省政府统计室之估计,实际管辖土

地面积为451521平方公里,人口1748453人<sup>①</sup>,其地理范围与今日四川省的甘孜州、凉山州和雅安市大致相同。

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1889—1964)、潘文华(1886—1950)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代主席张为炯(1887—1973)在康定传达了这一决定。

1950年1月1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在西昌重新挂牌,胡宗南(1896—1962)被任命为代长官,西昌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1885—1969)被任命为西康省“代主席”。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进驻雅安,随即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廖志高。3月24日、27日,康定、西昌分别被解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与部属、西康省政府主席贺国光等国民党政府要员飞向海南岛,西康省彻底解放,宣告了国民政府经营了11年的西康省就此终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沿袭历史的成例,于1950年4月26日设立了西康省最高行政机关——西康省人民政府,隶属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党政军领导分别为邓小平(1904—1997)、刘伯承

① 国民政府内政部主编:《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第11版),1947年(转引自周开庆:《民初四十年之西康》,《民国四川史事三集》,第151页)。另一估计说西康全省实际所辖地域面积为351521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人,见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7页(转引自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7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刘文辉在《新西康建设十讲》的第一讲中,估计全省管辖面积为535000平方公里,人口为300万(见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22—525页)。高秉鑫估计全省管辖面积为350000平方公里,人口为200万(见高秉鑫:《西康历程》,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委员会主编:《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2004年12月),第35页)。



(1892—1986)、贺龙(1896—1969),省人民政府办公地点设在雅安市,下辖康定、雅安、西昌、昌都四个专区。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西康省等建制的决议》,批准国务院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10月1日,西康省撤销,西康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退出了历史舞台。至此,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西康省在经历5年零5个月后画上了句号。

西康省撤销后,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可见,在30多年的建省过程中,西康省已经广为国人接受,并初步为国际所认可;西康省正式存在的17年中,它为国际广泛认同,跨越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省份。

## 二、西康近代社会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述,西康地区的地理范围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是内地与祖国西部的过渡地带,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故自古以来就是川藏道南、北两线交汇的中心,川藏之间的交通孔道,以及滇藏交通的枢纽<sup>①</sup>,以及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要地。这一地带,从藏族内的民系而言,处于藏族“确卡松”(chol-kha-gsum)即“藏地三区”的一部分;从民族成分而言,处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如汉藏、藏彝等各族文化接触交融与经贸频繁往来的中介位置,天然是近年来学界大力呼吁进行研究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所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麝香之

---

① 参见任新建:《论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历史作用》,“茶马古道”研讨会论文,2002年6月,西藏昌都。

路”的必经之地,以及种种“道”“路”在此的交汇,使得西康地区成为英国学者哈·麦金德(H. J. Mackinder, 1861—1947)所谓的“历史的地理枢纽”<sup>①</sup>。

这一特殊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自然使得西康地区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角色。自古以来,作为连接西藏与内地“桥梁”的西康地区,就成为中原关注的边疆地区之一,而在中国藏区、在中国版图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up>②</sup>

西康地区在中国传统典籍的记载中,从两千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以来,到被列入史传的《南史》、《隋书》、两《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乾隆《里塘志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清史稿》,可谓是史不绝书的。这正说明了西康地区在地位的重要性。

国外对西康地区的研究起于18世纪,早期主要为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的调查。19世纪末期以来,罗克希尔(William W. Rockhill, 又译柔克义, 1854—1914)、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石泰安(Rolf A. Stein, 1911—1999)等多位外国学者,积极参与西康研究,出版了《汉藏边境的古部落》、《岭格萨尔王的超人生活》等多部论著,蜚声国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近代以前。

① [英]哈·麦金德(H. J. Mackinder):《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63页。

② 陈重为在《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史地小丛书”,1930年版)一书中,专辟“第一部”《西康在全国之位置及其特质》,进行了论述(第1—42页)。